

# 三孩生育政策下政府治理绩效感知、政治信任和政策认同

## ——基于CSGS ( 2024 ) 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舒宇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三孩政策成为国家治理的实践场域。本研究基于 CSGS2024 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涵盖政府治理绩效感知、政治信任与政策认同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绩效—信任”对政策认同有双重协同路径：政府绩效感知主导政策认同构建，能正向影响政治信任与政策认同；政治信任经制度善意推定机制强化政策接受度，成为政府治理绩效感知与政策认同间的中介桥梁。为理解政策认同形成机制提供新视角，也为政府提升政策认同度、增强执行效果提供建议。

**关键词：**政府绩效感知；政治信任；政策认同；三孩政策

### 一、引言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人口问题的核心矛盾已从数量上的压力转变为结构上的挑战。自 2017 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连续几年呈下降趋势。就特定人口群体的平均生育意愿来看，生育率低于 1.6% 则被认为是“超低生育意愿”<sup>[1]</sup>。总和生育率在 1.5% 左右被认为是“高度敏感警戒线”，当跌破 1.5% 后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sup>[2]</sup>。自 2011 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一直在 1.5% 至 1.8% 之间波动，自 2020 年起连续四年低于 1.5%，2023 年更是降至 1.09%。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该文件明确阐述了全面三孩政策。这一举措是对我国人口状况作出的关键政策回应。在此背景下，研究公众对三孩政策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认同是指行为主体对某一事物的认可与赞同<sup>[3]</sup>。而政策认同强调个体对政府所推行政策及实践效果的认可与赞同<sup>[4]</sup>。深入了解公众对三孩政策的认同情况，有助于政府更准确地把握民意，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以实现政策效果的最大化。基于“中国社会治理调查”2024 年的数据（以下简称 CSGS2024）展开深入剖析，旨在厘清我国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作用与政策认同的具体路径，探究政治信任的中介传导效应以及挖掘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逻辑。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政府绩效感知与政策认同

从心理学层面来看，认同这一概念，通常被界定为个人在感情及心理维度上，与他人、群体或者模仿对象逐渐趋同的动态过程<sup>[5]</sup>。政策认同是“同意的治理”，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一种接受、认可并且积极支持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倾向<sup>[6]</sup>。在政治认同的范畴体系中，可细化为政策认同、执政党和政府认同、国家认同、制度认同以及价值认同<sup>[7]</sup>。其中，政策认同位于政治认同的最底部。

政策认同包含了情感上的依附与心理上的归属，表现为公众对政策的认可度与支持度<sup>[8]</sup>。因此，政策认同不仅涵盖了对政策内容的认同，还包括对政策主体、政策程序、执行方式以及结果的认同。从社会利益多元化视角来看，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对其政策认同感产生了影响。许春芳等指出，政策认知特征、政策参与情况、政策实施效果对政策认同均产生显著影响<sup>[9]</sup>。刘长勇发现，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认同度对其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sup>[10]</sup>。由此可见，上述学者普遍认为政府治理绩效对政策认同的构建具有显著影响。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履行其职能和职责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与效率。有学者提出政府绩效可细分为政治绩效、经济绩效和公共服务绩效三个方面<sup>[11]</sup>。对于绩效感知而言，其更加强调“对结果的感知”。在本文中，绩效感知的客体特指政府，即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在政治绩效与政策认同方面，曾渝等人提出中国式社区治理兼具自治与行政双重性质，能够增强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有利于将社区治理绩效转化为政府治理绩效<sup>[12]</sup>。在经济绩效与政策认同方面，赵晓园等人认为提高补奖资金发放效率，探索多元化补偿方式可提高牧民对生态及政策认知的程度<sup>[13]</sup>。在公共服务绩效与政策认同方面，吕慈仙等人指出得益于社会公共政策的有效支持，随迁子女培养了积极的教育期望，这进一步促进了公众对异地高考政策的认同<sup>[14]</sup>。大部分研究表明，政府绩效感知与政策认同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H1：政府绩效感知对公众的政策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二) 政治信任与政策认同

政治信任研究由来已久。Easton 在其政治系统论中提出，政治信任具备支持功能<sup>[15]</sup>。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政治支持是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sup>[16]</sup>。这种支持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信任，进而会成为人们采取与政府合作行为的先决条件<sup>[17]</sup>。公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对政府的支持力度越高，遵循和执行政府推行的政策可能性更大<sup>[18]</sup>。政治信任是理解公民与政府关系的重要命题<sup>[19]</sup>。根据 Easton 的政治系统理论<sup>[20]</sup>，当公众对政治体系持有“弥散性支持”(diffuse support)时，会将具体政策视为制度善意的延伸，从而降低政策质疑概率。

关于政治信任与政策认同的关系，杨慧青指出政治信任的提升强化了政策认同<sup>[21]</sup>。陶苞朵等人提出政治信任与公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呈显著正相关<sup>[22]</sup>。朱凯宁等人发现村干部的可信度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意愿以及支付意愿均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sup>[23]</sup>。因此，政治信任对于政策认同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H2：政治信任对公众的政策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三) 政府绩效感知与政治信任

善治构成了中国政府执政的核心目标，而政治信任则反映了公民对政府治理的认可与支持。关于政治信任来源的研究，William Mishler 和 Richard Rose 将其概括为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文化理论和制度理论<sup>[24]</sup>。文化主义强调传统价值观的延续性作用，如郑建君等基于人与情境交互作用理论提出，不同民主观念会对政治机构信任水平产生不同影响<sup>[25]</sup>。王正绪提出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理论是影响政治信任的核心价值立场<sup>[26]</sup>。而制度主义关注绩效反馈的理性建构，如黄嘉文、赵静发现制度绩效是农村青年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政治绩效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绩效<sup>[27]</sup>。

目前，国内已有很多关于政府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唐雲等人研究发现主观

评价绩效正向影响政治信任<sup>[28]</sup>。李梅等人指出各地政府治理绩效的不同，会直接导致农村居民政治信任的区域性差异<sup>[29]</sup>。陈永进等提出了政府清廉感知和政府治理绩效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关键因素<sup>[30]</sup>。由此可知，政府绩效感知和政治信任之间可能存在正向影响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3：政府绩效感知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H4：政治信任在政府绩效感知与政策认同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4 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英文全称为 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缩写为 CSGS）。CSGS 通过定额抽样，覆盖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预抽取 6000 户家庭，最终完成有效问卷 3694 份，应答率为 61.6%（城市 2032 份，农村 1662 份）。调查严格遵循社会科学规范，为后续各项研究分析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数据基础。CSGS2024 满足本文研究所需，据此选取相关变量。

#### (二) 变量的定义和测量

##### 1. 被解释变量：政策认同

政策认同是指民众对于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政策的接受程度与支持程度。在本文中，政策认同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量化民众对于三孩政策的认同，根据问卷选取了关于是否支持三孩政策的一个问题，如表 1 所示。

表 1 政策认同测量表

提问	测试内容	选项赋值
关于以下生育观念，请表明您的态度	总的来说，我支持“三孩政策”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 2. 解释变量：政府绩效感知

基于前文阐述，本研究筛选 10 个极具针对性的问题，用于量化评估民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满意度，具体详情可见表 2。

表 2 政府绩效感知测量表

提问	测试内容	选项赋值
请对您所在地区以下的政府工作进行总体评价	1. 社会和谐	非常不满意（1）
	2. 社会公平	比较不满意（2）
	3. 食品安全	说不上满意不满意（3）
	4. 教育服务	比较满意（4）

续表

提问	测试内容	选项赋值
请对您所在地区以下的政府工作进行总体评价	5. 医疗服务	非常不满意 (1) 比较不满意 (2) 说不上满意不满意 (3) 比较满意 (4) 非常满意 (5)
	6. 养老服务	
	7. 就业服务	
	8. 腐败治理	
	9. 环境治理	
	10. 公民政治权利保障	

### 3. 中介变量：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本文的中介变量。本文聚焦于狭义上的政治信任，特指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赖程度。狭义的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信誉及民众政治倾向的关键要素。本研究主要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进行政治信任的测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政治信任测量表

提问	测试内容	选项赋值
请对您判断对以下机构或组织的信任程度	1. 中央政府	非常不信任 (1) 比较不信任 (2) 说不上信任不信任 (3) 比较信任 (4) 非常信任 (5)
	2. 省级政府	
	3. 市 (区) 级政府	
	4. 县级政府	
	5. 乡级政府 (街道办)	

### 4.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可能对模型估计结果造成的偏差，在具体分析时，额外引入了几个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即受教育年限）、月收入以及职业，如表 4 所示。

表 4 样本特征分布描述

变量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1724	46.7
	女	1970	53.3
年龄	25 岁以下	1375	37.2
	25 ~ 35 岁	827	22.4
	36 ~ 45 岁	533	14.4
	45 岁以上	959	26

续表

变量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
教育程度	本科	1698	46
	本科以上	339	9.2
	本科以下	1657	44.9
月收入	3000 元以下	1682	45.5
	3000 ~ 4999 元	833	22.6
	5000 ~ 10000 元	777	21
	10000 元以上	1996	54.1
职业	在校学生	1281	34.7
	企业人员	1203	32.6
	政府单位人员	250	6.8
	其他	960	26

### (三) 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借助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探究政府绩效感知、政治信任与政策认同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量化其因果关系，揭示其传导路径。构建用以阐释三者关系的模型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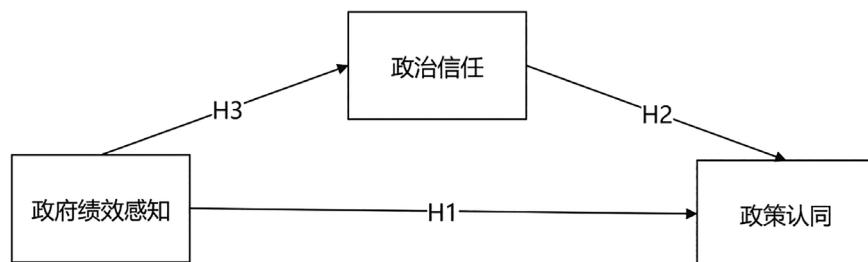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 四、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正态分布检验

本研究对题项数据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与正态性检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平均得分集中在 2 至 5 分区间，为初步把握数据集中趋势提供了重要依据。正态性检验依据偏度和峰度值，当偏度系数绝对值小于 3、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 10 时，可将数据视为近似正态分布，可进行后续分析。(见表 5)。

表 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正态分布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政策认同	I4	3.2	1.1	-0.387	-0.458
政府绩效感知	H1_1	4.09	0.769	-0.942	1.648
	H1_2	3.7	0.99	-0.648	0.001
	H1_3	3.47	1.116	-0.511	-0.56
	H1_4	3.63	0.996	-0.646	-0.067
	H1_5	3.67	0.961	-0.712	0.189
	H1_6	3.5	0.998	-0.398	-0.358
政府绩效感知	H1_8	3.24	1.097	-0.203	-0.677
	H1_10	3.5	1.066	-0.59	-0.204
	H6	3.4916	0.83152	-0.362	0.149
	J2	3.2377	0.9151	-0.136	0.169
政治信任	G1_1	4.46	0.76	-1.536	2.67
	G1_2	4.33	0.797	-1.218	1.6
	G1_3	4.19	0.864	-1.043	1.03
	G1_4	4.01	0.959	-0.889	0.476
	G1_5	3.86	1.019	-0.8	0.242

## (二)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评估测量数据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过程，用信度系数表示内部的一致性，信度系数越高表示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越高。本文使用 SPSS 26 软件测量 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测量量表的信度，当 Cronbach's  $\alpha > 0.7$  时，表示内部一致性是可接受的，如表 6 所示，针对衡量政府绩效感知与政治信任的量表，均精准测得了克隆巴赫系数，且二者所得系数均超越 0.9 这一关键阈值。依据学界广泛认可的评判准则，所运用的量表无论是在内部一致性方面，还是在稳定性维度上，均达到了极高水准。

效度作为衡量测量精准度的关键，指标关注测量结果与预设内容的契合度。本研究采用 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对效度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政府绩效感知量表的 KMO 值为 0.932，政府信任量表的 KMO 值为 0.837，且两者的 Bartlett 球形检验 P 值均小于 0.005，表明两个量表均通过效度检验。

表 6 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克隆巴赫 Alpha	KMO 值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项数
政府绩效感知	0.907	0.932	$0 < 0.005$	10
政治信任	0.919	0.837	$0 < 0.005$	5

## (三)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绩效感知与政策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r=0.205$ ,  $P < 0.01$ )，政府信任与政策认同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 ( $r=0.191$ ,  $P < 0.01$ )。此外，政府绩

效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同样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 $r=0.552$ ,  $P < 0.01$ )。这些发现为后续的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 7 相关性分析

变量	相关性	政府绩效感知	政府信任	政策认同
政府绩效感知	皮尔逊相关性	1		
政府信任	皮尔逊相关性	0.552**	1	
政策认同	皮尔逊相关性	0.205**	0.191**	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四)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8可知，模型1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性别等控制变量及政府绩效感知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在模型1中，政府绩效感知的回归系数为0.552，且P值小于0.01，表明政府绩效感知对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证实了假设H3。在模型2中，运用科学的回归分析方法展开深入探究，将政策认同设定为因变量，把政府绩效感知设定为自变量，以此剖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显示，政府绩效感知的回归系数为0.203，P值同样小于0.01，即政府绩效感知与政策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假设H1也得到有力的数据支撑。

进一步地，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政治信任这一变量。此时，政府绩效感知的回归系数变为0.144，P值仍小于0.01，而政治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108，P值也小于0.01。这表明当政府绩效感知发生变化时，并非直接单一地作用于政策认同，而是部分地通过影响政治信任，再由政治信任进一步传导至政策认同，使得三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有机影响链条。所以，假设H2和H4均成立。

综上所述，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印证了政府绩效感知、政治信任和政策认同这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模型结构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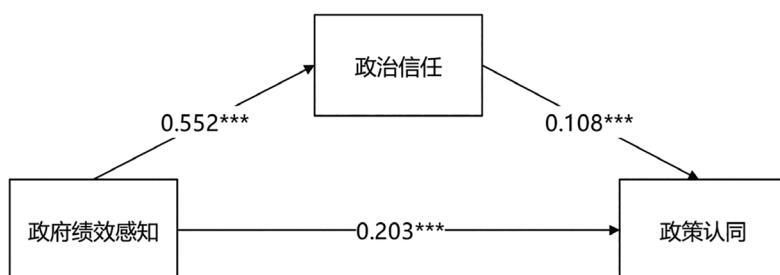


图2 关键变量中介效应检验

表8 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beta$	t	$\beta$	t	$\beta$	t
性别	0.021	1.494	-0.116***	-7.386	-0.119***	-7.559
年龄	0.053***	2.939	0.196***	9.579	0.191***	9.33
教育程度	0.027	1.534	-0.043**	-2.168	-0.046**	-2.323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eta$	t	$\beta$	t	$\beta$	t
月收入	-0.02	-1.231	0.029	1.544	0.031*	1.668
职业	0.015	0.962	0.021	1.215	0.02	1.128
政府绩效感知	0.552***	40.165	0.203***	13.077	0.144***	7.748
政治信任					0.108***	5.814
R <sup>2</sup>	0.307		0.113		0.12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五) 中介效应检验

在本研究中，为进一步验证相关效应及其稳健性，采用了 Bootstrap 方法进行置信区间估计检验，如表 9 所示。首先，总效应为 0.3355，其对应的 95% 置信区间 (0.2852, 0.3859) 不包含 0，这一关键特征表明总效应是显著成立的；其次，直接效应 0.2373，95% 置信区间为 (0.1773, 0.2974)，同样未涵盖 0，说明直接效应成立；最后，中介效应 0.0982，其 95% 置信区间 (0.0622, 0.134) 不包含 0，这一结果验证了中介效应成立。此外，直接效应占比 70.73%，中介效应占 29.27%，表明直接路径在自变量影响因变量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表 9 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估计

项目	效应值	间接效应的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相对效应值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3355	0.0257	0.2852	0.3859	
中介效应	0.0982	0.0186	0.0622	0.134	29.27%
直接效应	0.2373	0.0306	0.1773	0.2974	70.73%

## 五、研究结论

### (一)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模型，系统揭示了政府绩效感知、政治信任与政策认同间的复杂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 政府绩效感知对政策认同具有显著正向总效应；(2) 政治信任在二者间起关键中介作用，即政府绩效既直接促进政策认同，也通过提升政治信任间接强化认同；(3) 政府绩效感知与政治信任对政策认同的相对效应值分别为 70.73% 与 29.27%，表明绩效感知是主要驱动因素，政治信任则为重要补充因素。

本研究结果为政府提升政策认同度与增强政策执行效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一是政府应将提升绩效水平作为核心战略，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强化政策传播效能以及深化政策执行透明度，增强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与认可。二是政府需将政治信任的构建作为政策认同形成的关键中介机制。通过制度化透明决策机制、强化反腐败治理体系以及构建多元化的公民参与平台，进而显著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三是应积极构建以民意为导向的政策反馈机制，通过系统化民意

调查与实时化政策评估，精准把握社会需求与公众诉求，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政策公信力与社会认同感。以上建议旨在优化政策治理效能，构建可持续的政策认同机制。

## (二)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探讨政府绩效感知、政治信任与政策认同之间的关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数据主要来源于特定区域或时段，样本代表性有限，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扩大数据覆盖范围以增强外部效度。其次，变量测量虽力求准确，但仍存在主观偏差，后续可开发更客观的量化方法。此外，变量间可能存在更复杂的机制未被充分探讨，未来可引入调节变量或动态分析，进一步完善理论模型。

随着政治信任和政府绩效感知在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研究将具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后续工作可聚焦于如何通过政策设计与执行有效提升政府绩效与政治信任，进而增强公众政策认同。同时，可探索运用新方法与技术提升研究效率与深度，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更有力的学理支持。

**作者简介：**张舒宇，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学院），硕士。

## 参考文献

- [1] 吴帆. 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 [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 (4): 218–240+246.
- [2] LUTZ W, SKIRBEKK V. Policies Addressing the Tempo Effect in Low Fertility Countrie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5 (4): 699–720.
- [3] 王国红. 试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认同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4): 46–49.
- [4] 周忠良, 曹丹, 刘观平, 等.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 [J]. 公共行政评论, 2023, 16 (5): 125–140+199.
- [5]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75.
- [6] 袁方成, 李会会.“同意的治理”：理解政策认同的实践逻辑——Y县宅基地改革观察 [J]. 探索, 2020, (3): 142–155.
- [7] 彭正德. 论政治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功能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43 (5): 87–94.
- [8] 夏志强, 田代洪. 恰适性联结：政策认同如何促成政策变现——对“耿车绿色转型”政策执行过程的追踪分析 [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 (1): 219–226.
- [9] 许春芳, 曹海林. 农户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认同分析——苏北F镇个案调查及启示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 (4): 86–92.
- [10] 刘长勇. 生活满意度、政策认同与农民的乡村振兴参与意愿——基于全国223个村庄1163位农民的调查分析 [J]. 武陵学刊, 2020, 45 (5): 53–61.
- [11] 胡荣, 范丽娜, 龚灿林. 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J]. 社会科学研究, 2018, (6): 105–113.
- [12] 曾渝, 张志原, 严洁. 社区治理、政治信任与政策遵从：来自列举实验的证据 [J]. 治理

研究, 2025, 41 (2): 110–122+160.

[13] 赵晓园, 高启杰, 黄圣男, 等. 组态视角下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提升路径研究——基于藏北地区的实证分析 [J].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23, 41 (4): 737–745.

[14] 吕慈仙, 孙亚男, 智晓彤. 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探究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2, 24 (1): 58–67.

[15] EASTON, DAVID.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5.

[16] 王甫勤. 社会治理绩效评价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8)”数据的工具变量分析 [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5, 41 (1): 66–77.

[17] LEVI M, SACKS A, TYLER T. Conceptualizing Legitimacy, Measuring Legitimating Beliefs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9, 53 (3): 354–375.

[18] 李宝军, 王博, 罗剑朝. 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2022, (12): 165–175.

[19] 孟天广.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 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3 (2): 1–10.

[20] EASTON D.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5, 5 (4): 435–457.

[21] 杨慧青, 彭国胜. 政府治理绩效对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10): 37–47.

[22] 陶苞朵, 张等文. 政治信任何以转化为政治认同——基于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3 (5): 52–65.

[23] 朱凯宁, 高清, 靳乐山. 收入水平、村干部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 465 个农户调研数据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 (10): 2512–2520.

[24] MISHLER W, ROSE R.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1, 34 (1): 30–62.

[25] 郑建君, 赵东东. 不同类型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影响——基于国家 (地区) 发展状况的分析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3 (6): 47–55.

[26] 王正绪. 政治信任研究: 民本主义的理论框架 [J]. 开放时代, 2022 (2): 179–193.

[27] 黄嘉文, 赵静. 农村青年的基层政治信任来源: 制度还是文化? [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21 (5): 101–111.

[28] 唐雲, 王英. 主客观视角下的制度绩效、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 (5): 170–180.

[29] 李梅, 彭国胜. 政府治理绩效与农村居民政治信任关系及作用机制 [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8 (4): 151–161.

[30] 陈永进, 祁可, 何宁. 清廉感知、依法办事水平与政府公信力——基于 CGSS 2015 和 CSS 2017 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 (3): 68–83.